

白族古代碑刻概述

张 锡 禄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伙。子、尼、伙都有汉族语人的意思,即白人。他称:名家(民家)、勒墨、拿马等。人口159万(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主要聚居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的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云龙等县市,其他如昆明、保山、楚雄、玉溪、文山等地区有少量聚居。在四川省的西昌、贵州省的毕节、湖南的桑植等地也有少量居住。

白族是我国西南文化、经济发展都比较高的民族之一,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在我国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时代,是主体民族之一,为开拓祖国的西南边疆,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作了很大贡献。白族古代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碑刻便是其一,据统计,现存白族古代(即清末以前)的碑刻约有500通,以每通平均1000字计算,约50万字。它记录了白族的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经济、科技等诸方面的资料,值得认真整理,深入研究。鉴于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本文仅就其历史分期及分类作一综合性的叙述,使读者有个较全面的认识。

一、古碑的分期

按刻碑的时间顺序,大体可分为:汉晋、南诏大理国、元代、明清四个时期。时间跨度1500年左右。

（一）汉晋时期

云南早期的碑刻较著名的有：《孟孝琚碑》，方国瑜考证约为公元96年刻^①；《爨龙骧刻石》，东晋简文帝泰和五年即公元371年刻^②；《爨宝子碑》，东晋大亨四年，相当于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刻；《爨龙颜碑》，刘宋武帝大明二年，即公元458年刻。三通爨碑均发现在今曲靖陆良一带，古为石城，即西爨白蛮故址。从《爨龙颜碑》的爨，分“东西二境”之语可知，早在刘宋时期东西二爨业已分明了。

近年来，云南史学界认为，云南从汉晋时代直至南诏中期，统治南中地区达400多年之久的爨氏一部西爨白蛮是今天白族的先民。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考证道：“樊绰《云南志》卷四曰：‘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从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猷、安宁至龙和谓之西爨；东北自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之。’所说地名，西爨之石城在今曲靖……又东爨之曲靖州，在今昭通。”^③

尤中先生在《中国西南民族史》一书中，引用《云南志（蛮书）卷四》关于东西二爨的分布之后说：这里所说的“爨”并非民族名称，而是当地统治者的姓氏。“白蛮”即白族，“乌蛮”乃近代彝族。在爨氏统治区内，白族与彝族是普遍交错杂居的。一般说来，白族的绝大部分住在平坝，而彝族的绝大部分则“散居林谷”。但又各自有一片主要聚居区。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猷、安宁、龙和一带，地域偏西，多平坝，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区；但同区域内的山区也有彝族。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一带，地域偏东，多山而平坝较少，是彝族的主要聚居区；但同区域内的坝区也有白族。此区域内的统治者爨姓本身的民族成份则为白族。^④

尤先生的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我们则断定此三通爨

碑为白族先民的碑刻。另外，从碑刻的书法上来说，大小爨碑是极佳的，被誉之为“神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白族先民是云南最早接受汉文化影响的群体。白族中爨姓从汉晋时期一直保留至今，今大理、鹤庆一带仍有爨姓，简写为寸姓，仍是白族。保山腾冲一带的寸姓原也是白族，为西爨白蛮爨姓之裔。有家谱及古代墓志碑铭可考^⑤。《元史·兵志》上说的云南土军叫“爨焚军”。同是元代的记录又写作“寸白军”。可见爨与寸后来是相通的。

白族学者杨延福先生在《对“滇绎、秀才廉良”的启示及补述》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汉代，云南白族人，已是有汉文学较好的知识分子。昭通《孟孝琚碑》的孟姓，曲靖《爨宝子碑》、陆良《爨龙颜碑》的爨氏都是白族。^⑥

（二）唐宋时期

在我国历史上的唐宋时期，以今大理白族地区为中心，曾先后建立过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与唐宋两王朝共始终，时历500多年。

现存的南诏时期的重要碑刻而又与白族的历史文化有关的有四种：它们是《王仁求碑》、《南诏德化碑》及剑川石宝山丰佑天启十一年沙退附尚邑张傍龙闾家造像记、元改造像记二种。这四种碑刻，除《南诏德化碑》的作者是郑回还是王蛮利（盛），学术界有争议外，而其他三种则是白族先民无疑。

《王仁求碑》在今安宁县大石庄。碑约高281厘米，宽150厘米。共34行，行53字；碑额10字。均正书。

此碑立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为南诏第二代王蒙罗盛24年。是王善宝为其父“河东州刺史”王仁求而立的。此碑自发现以来，即引起治云南地方史的学者的注意，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如《云南考古》的作者指出：“《王仁求碑》中还有一个问题未能解决，即王仁求为刺史的河东州究在何

处？”据笔者近年多次到洱海以东进行文物考古并参看《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等历史资料得出，唐·樊绰《蛮书》所记河东州在今大理凤仪一带是正确的。因为唐初洱河蛮分东、西两大部分。以洱河（海）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住洱河（海）东面的民族被称为东洱河蛮，住西面的为西洱河蛮。东洱河蛮首领所统治的区域又称之为河东州。包括今凤仪、海东、挖色、祥云、弥渡、姚安、大姚一带。这与碑文相符。碑文称仁求“招慰奏置姚府以西廿余州，俾睦其德”。《旧唐书·张柬之传》说：“垂拱四年，蛮郎将王善宝，昆明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奏言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这说明王仁求是姚州府以西一带的白蛮——东洱河蛮的大首领是今白族的先民。

此碑证实，蒙舍诏之所以得到洱海地区，不仅是唐王朝的扶植，而关键的一点是蒙舍诏首先得到东洱河蛮的支持，靠此，去联系唐王朝，又联合被打败的与其同在一川的蒙隽诏的蒙俭。因此蒙舍诏（南诏）大盛。碑文说：“贪戾君长（按酋长），负远放命，灾我城邑，延我平人，扬瓜州刺史蒙俭，实始其乱。咸亨之岁，犬羊大扰，梟将失律，元凶莫惩。”指的就是联合打击蒙俭的战争。

《南诏德化碑》在今大理市太和村的南诏太和城遗址。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高约302厘米，宽223厘米，厚58厘米，两面刻字，立于“赞普钟十五年”，即唐代宗大历元年（766），碑文对阁罗凤统一六诏的史事记载详实，凡南诏前期的政治制度、社会情况、农业水利、手工业生产等都有所反映。更主要的是从南诏国的立场出发，记叙了唐王朝与南诏国之间“天宝之战”的经过。说明“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而揭碑国门，并说“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吾罪也。”表达了南诏一心一意归奉唐王朝的思想。该碑证明，云南自古以来便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

份，云南境内的各民族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该碑受到历代史家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倍受珍视，为研究南诏史的第一手资料。

碑文原有3800字，历千年风雨碑字多漫漶，至今仅余800余字。^⑦徐嘉瑞先生赞道：“息胎左氏，其辞令之工巧，文体之高洁，在有唐大家中，亦不多见”，“至其铭文，颇类会稽刻石，掷地有金石声，非同凡响”。^⑧碑文的书法“有晋唐风貌，兼具北海遗风”，是为上品。

宋代大理国的碑刻不多，数百年来，载之各种史籍的只有四、五种，最多没有超过十种的。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说过：“得唐碑易，得宋碑难。”近年来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各方面人士的努力，大理国时期的碑刻铭文陆续出土，经统计大理国时期的碑刻铭文共有22种。可以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这22件碑铭有7000余字，为宋史《大理国传》的十倍有奇，给研究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宗教等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在政治方面，对大理国王段氏（白族）与权臣高氏（白族）的记载尤多。

涉及段氏的，如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的《石城会盟碑》，碑文大意：段子琬等奉大理国主之命，率领戎行巡阅边塞，因巡众镇长奇宗不服，用兵剪除，与求州三邑首领安辑其民，复置巡众镇，回军至石城，更讨不服者，乃合集三十七部首领及十二将兴约盟誓，颁赐职赏，共图长久，勒石纪之。这对研究大理国时期当地的少数民族状况极为重要。碑无撰文书丹者姓名，其文朴质，书法流利。叶昌炽《语石》卷二称该碑“精采飞动”，且曰：“虽荒离之士，书法亦入能品”。方国瑜先生说：“此碑不仅书法唐人遗意，且为大理史事之最关重要者，而史籍记载并无一字，尤为难得也”。^⑨铜阿嵯耶观音背部的《段政兴资发愿文》对研究段氏对佛教密宗的信仰及夹佛号名制问题有一定价

值。^⑩

研究大理国权臣高氏的碑铭则有十余件，如：《护法明公德运碑赞》、《兴宝寺德化铭》、《大理国释氏戒净；□绍高兴兰若篆烛碑并序》、《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大理国故高姬墓铭》、《高生福墓志铭》、《褒州阳派郡稽肃灵峰明帝记》、《白王墓碑》、《高公辅政碑》、《大理千寻塔出土刻文金属片》3件。这12件碑铭对高氏与国王段氏的关系；与其他名家贵族的关系，高氏的父子连名制；高氏家族的婚姻关系；高氏的佛教密宗的信仰等都有了记载。

《大理国彦责赵兴明之母墓幢》等，对于白族的火葬习俗作了记载。

（三）元代

1253年（元宪宗三年），蒙古贵族的军队攻占了大理城，大理国至此灭亡。从此以后，云南作为一个行省，直接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吏管理，白族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大理白族地区的元碑过去著录的不多。主要有《元世祖平云南碑》（约1306）、《孔庙圣旨碑》（1294）、《大崇圣寺碑》（1325）、《段信直宝摩岩碑》（1370）等。近40年来陆续发现的有《故正直恭谦和尚墓碑铭并叙》、《元故副相墓碑》、《鹤庆路王氏墓志并序》、《□□□寿宗碑志》等。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1977年至1979年，王云、方龄贵二位教授与大理文化界人士，在大理五华楼遗址发现并拓印整理出元碑66通，“其中汉字清晰的有58通，比较首尾完具的竟有20余通之多”^⑪这是大理白族地区元碑一次大发现。它们是：

1.《故大理陈氏墓铭并叙》2.《故大理路□□□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3.《大理路兴举学校记》4.《陈氏墓碑铭并序》5.《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6.《无名残碑》7.《段氏长老墓碑铭并序》8.《赵连庆碑》9.《大理路庙学残碑》10.《□兆郡夫

人墓志铭》11.《□大理□差库大使董踰城福墓志》12.《至正七年残碑》13.《故父张照磨墓志》14.《故理阳寨长官司案牍段璉墓铭并序》15.《敕授鹤庆路照磨杨伯□墓志》16.《追为亡人张踰城端神道》17.《故神功梵德大阿左梨赵道宗墓碑》18.《追为亡人大师李珠庆神道》19.《追为亡人杨庆良神识》20.《追为亡人杨昭宗神道》21.《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并序》22.《杨药师生碑》23.《张闭通碑》24.《杨生善碑》25.《布鲁罕碑》26.《释道兴碑》27.《释戒超碑》28.《周智太碑》29.《杨踰城实碑》30.《苏参碑》31.《杨成庆碑》32.《李明德碑》33.《杨禧碑》34.《杨踰城佩碑》35.《段观音善碑》36.《苏升福碑》37.《李踰城连碑》38.《董益碑》39.《杨生直碑》40.《杨庆碑》41.《张福日碑》42.《段踰城顺碑》43.《苏祥福碑》44.《张齐□碑》45.《李贤生碑》46.《译史杨公碑》47.《李明益碑》48.《云南县残碑》49.《张顺兴碑》50.《杨观音护碑》51.《任祥公残碑》52.《赵踰城公碑》53.《南无西方阿弥陀佛碑》54.《张兴光碑》55.《张氏残碑》56.《园悟残碑》57.《张踰城盛碑》

方龄贵先生指出：“新碑首先对元史（包括北之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元代云南历史的研究有帮助，这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还远不止此。因为在碑文（特别是墓志中）叙事每每追溯到前代，这就不免涉及元朝以前的历史。唐宋和南诏、大理的历史不用说了，有时还牵连到唐宋以前的历史及其他方面。”^②这是正确的。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批碑是在元代白族聚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大理地区发现的，绝大多数碑文的作者都是白族人，它们记载了白族史，白族文化，白族宗教和民俗上的许多东西，是值得珍视的。近来，在洱海和大理海东等地区又陆续发现了几通元碑，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四) 明清时期

明清两代，大理白族地区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内地交往也较前期有增无减，人口也有所增长。这一时期文风盛炽，刻碑勒石形成风尚，从城镇到乡村到处有碑可见。在洱海周围白族聚居的村邑山后的成片古墓地上，明清两代的墓坟累累相望，其墓志铭成百上千不可计数。较为著名的有大理点苍山上的喜洲弘圭山古墓群、剑川中科山古墓群、沙溪鳌凤山古墓群、洱源凤羽古墓群、大理凤仪古墓群、大理海东古墓群等。在云龙县还有顺荡古墓群。弘圭山古墓群的碑刻，石钟健先生曾在1942年作过调查。他在《大理喜洲访碑记》中说：“（狗街）街子以西，是一片低的平邱，里边葬满了清代的坟墓约有几千个，从坝子的西边上山约三四里都是缓缓的平坡，……这里则有明代的坟墓约几百个，当中也间或有几个清坟，这个地方我称它为弘北区，从这里往南，越过一个山溪，约一二里，又是一片明墓，约有一千多。这一区，我称它为弘南区。从这里再向西南走，地势渐渐的高，明初的坟墓愈少，晚明的坟墓较多，……这一区，我称它为弘西区。从这里再往南走，过几条溪涧，约有五六里，沿坡都是清坟……下坡往东约有二里，直达公路，在近路边的地方，有块墓地，约在二亩大，完全是明代坟墓，共有四十多个，当地的人说，这里在江渡村的下面，我就称它为江渡区，从弘北区向北行，到上阳村瀑布，这一地带，仅有清坟”。“明墓清墓都有碑志……”^⑬

仅就石先生所记的情况该弘圭山有明墓一千几百座，有清墓几千座，两者至少有五千座以上，每座墓都有墓志。那么在1942年时弘圭山有白族明清两代的墓志铭在5000通以上。据笔者所知，除弘圭山之外，附近三颗石，莲花山等都有大片明清的墓地。各处坟墓少则几百多至上千座，所以有人称弘圭山为白族的山野博物馆，一点也不过份。可惜50年后的今天，大多数碑刻无

存，仅余 200 多张拓片和上百通碑石而已。

弘圭山仅一例而已，整个大理地区明清两代的碑刻原有一万通以上。而今笔者所目睹有拓片者仅 400 余通。这批碑刻记录了这个时期白族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诸方面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古碑的分类

从形制上分，主要有扁方形和方园柱形两大类；从文字上分，有白文、汉文、梵文 3 种；从内容上分，有政德、宗教、水利、乡规民约、墓志、家谱、经济等；从碑的质地来分，也有 4 种。现分述于下：

（一）形制

其形制主要为扁方形。内有正方形，长方形圭形之分，以长方形为多。有部分墓志铭，上有半圆形碑额，下为长方形碑铭。方园柱形主要是经幢。白族古代佛教密宗盛行，佛教徒往往凿石为幢，刻经及佛像于上，以祈佛佑。经多为梵文经咒，尤以陀罗尼经最为普遍。白族古代经幢以昆明地藏寺《石幢》最为著名。该幢为宋代大理国时期的作品。石幢为七级八面，由五段砂石组成。高 650 厘米，周雕密教佛、菩萨及天龙八部共 300 躯，大像高约 100 厘米，小像不足 3 厘米。刀法遒劲，精美绝伦。中外专家推崇为滇中艺术极品。在石幢基座与第一级幢身之间界石上，阴刻汉文《造幢记》、《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大日尊发愿》及《发四宏誓愿》。《造幢记》题衔：“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皇都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众洞明儒释慈济大师段进全述”。此幢为云南古幢中最大者。一般元、明经幢高约一米左右，园顶八方、六方形或者偏方形柱体。此种经幢遍及大理、昆明、西昌等地白族火葬墓地。

（二）文字

1 白文 白族没有通行的文字。但有流行一种用汉字记录白族语言的“白音方块字”，被称之为“白文”。现在发现的这种白文镌刻的石碑有12通。有大理国时代的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会盟碑》，元代的《段信苴宝摩岩碑》，明代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即《山花碑》，清代的《屯城羌道人健庵尹敬夫妇预为冢记》等。这些白文碑是白族古代碑刻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近半世纪以来，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范文田、徐嘉瑞、李家瑞、方国瑜、石钟健等老一辈民族学家及徐琳、赵衍荪等白族语言学家，撰写过有关文章。近年来我们又陆续发现了几件前人没有发现的白文碑。而且在用白语释读方面也有所突破。

2 汉文 白族自古以来习用汉文。考古学者在大理地区发现了汉晋时代的几批汉文铭文砖。说明汉文在汉晋时代已在大理白族地区流行。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的先民更是积极的吸取中原汉文化，汉白文化的交流更深入，广泛。在白族名家大姓中间涌现了一大批汉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书写了大批的汉文的碑铭。元明清以来，祖国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更进一步加强。白族中的知识分子掌握汉文的越来越多，书写的汉文碑铭更多。所以白族现存的古代碑刻多数是用汉文书写的。

3 梵文 在唐代南诏中后期，佛教密宗在南诏国逐渐传播开来，首先为白族上层贵族知识集团所接收，然后向民间传播。在宋代大理国极盛，元明仍不衰，至清逐渐衰落。佛教密宗所习用的梵文经咒，如《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佛说波若波罗密多心经》、《八字真言》等。前二种多刻在墓志铭的后面，即碑阴；有的也刻在正面，在梵文中插入横书或直书汉文“追为慈考（或亡人）××神道（或神识）”的字样。《八字真言》多篆刻在半圆形的碑额之上。这些梵文经咒是一种追荐亡人的经咒，为白族古代密僧阿吒力所书写。阿吒力僧以咒术行教，当时凡白族聚居之地总有一位至几位阿吒力僧人，家中死了人要请他作法事，墓碑

上要请他书写经咒。最常见的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因为佛教密宗认为“此咒能无众生一切恶业，能济幽冥、地狱、极苦。普能广利一切众生”。

现存的梵文碑最早的是大理国时期的，最晚的是明末。主要出土在洱海及滇池附近的火葬墓地。另外四川省的西昌、贵州的毕节等地也有发现。云南境内大凡白族聚居过的地方都有梵文碑发现，如丽江的九河，保山的腾冲，楚雄的姚安、大姚、禄丰等。此种梵文碑刻对研究佛教密宗阿吒力派在白族地区的形成、发展及衰落提供了实物和资料，很值得重视。

（三）内容

从内容上来分有政德、宗教、水利、乡规民约、墓志、家谱、经济等七类。

1 政德 这类碑不多，但史料价值较高。如南诏时期的《南诏德化碑》，大理国时期的《兴宝寺德化铭》、元代的《元世祖平云南碑》等为代表作。有补史、正史的作用。

2 宗教 这类可分本主崇拜、道教、佛教等。本主神的崇拜是白族一种独特的信仰，是白族村寨的保护神。每一村或二、三个村寨共同信奉一个本主神。本主神大都有本主庙，本主庙内有碑刻，记录该村本主的来历，如大理市凤阳村的明代的《三灵庙记》；有的记录兴修或重修本主庙的经过，如清代的《重修将军庙正殿功德碑》等。这类碑刻在宗教类中最有特色。

道教在白族中传播有悠久的历史，其先于佛教的传播。许多道教的宫观之内都有碑刻，但以修建缘起和捐款项、田亩、财物的记录为主，没有更多的内容。

佛教的碑刻占大多数，反映了佛教在白族中传播之盛和时间之长久。著名的有南诏时期剑川石宝山张傍龙闾家造像记及元改造像记；大理国的《昆明地藏寺经幢》、《高兴兰若篆烛碑》《皎渊塔碑铭》；元代的《段信直宝摩岩碑》、《大光明寺住持

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大崇圣寺碑铭并序》、《大理崇圣寺白话碑》；明代的《法藏寺铭》、《班山常住田记》、《昭应寺碑记》、《石宝山记》；清代的《王公置买班山碑记》、《观音古阁碑记》、《灵宝塔碑记》等。从这些碑刻可以窥视佛教传入白族地区的时间、地点、路线、宗派及与白族本土文化的冲突、交融的过程。更留下有关佛寺及古塔建筑更替过程的资料及寺院地租、经济等材料。

3 水利 白族是定居的，以水稻农耕及渔猎经济为主的民族，水利设施是白族古代农业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记载水源的开发、利用、所有权，记载水利设施及产权的碑刻就应运而生了。如鹤庆县清代的《重开水峒记》、《开漾弓江新河记》、《羊龙潭水利碑》等。

4 乡规民约 在白族民间，经过长期的生产劳动、生活交往，形成了一定的乡规民约，用以规范大家的行为，使之有章可循，有约共遵。这些乡规民约，写在纸上或刻在木头上不便永久保存，于是便刻碑勒石，以存永久。这些碑的内容，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有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有反对婚丧喜事大操办，有主张勤俭节约的；有反对赌博、偷盗行为，主张正直作人自食其力的；有反对斤斤计较争讼不停，主张团结一致、相互帮助的；有反对破坏水源、森林，主张公益事业。有些对我们今天搞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剑川金华山麓岩场口古财神殿内的《保护公山碑记》^⑭提出：“禁岩场出水源头处砍伐树；禁放火烧山；禁砍伐童松；禁挖树根；禁贩卖木料”等措施。这些规定，至今都起着积极的意义，体现了白族古代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

5 墓志 这类碑刻占的比例最多，尤其是白族名家大姓段、高、杨、赵、李、董、王、尹、何、张、杜、苏等姓氏人家的墓志铭，现存的有二、三百通。这些墓志铭反映了墓主人的一生活

动的重要方面，虽有些阿谀逢迎之词，但总的不失一种历史资料。对研究一定时代的一些人物活动有一定的价值。有些政治人物、宗教职业者、手工艺人、文艺活动家的墓志铭记录了为正史、野史、地方志不载的许多重要资料，值得研究。

6 家谱 白族的许多宗祠的遗址内保存该家族的家谱碑。典型的如大理市凤仪北汤天的董氏家祠与喜洲镇董氏家祠的《董氏家谱碑》，记述该董氏从南诏国到清末一千余年四十多代人物的名讳和主要活动，有一定的价值。

7 经济 有一部分碑刻记录了白族古代的经济情况，尤其是用贝币进行交易的历史，如凤仪明代的《庄公神祠碑》，对当时用贝币作货币交易的记载尤详；大理的《石碑宅祖庙记》也记载了用贝币的情况。其他的很多寺庙的功德碑，对当时修建寺庙用工料的经济帐目、寺产来源及产权关系都有记录，是不可多得的古代白族经济史料。

（四）石质

从石质上来分，白族古碑用料主要有粗面岩、细青石、沙石、大理石几种。明代前以粗面岩、细青石、沙石为主，大理石极少见。明代后以大理石为主，有地方民族特色。

总之，白族古代的碑刻是十分丰富的，保留至今的更值得我们加倍珍视，也是有待于我们开发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仅抛砖引玉作个概述，以教正于史学界的诸先进。

注：

①方国瑜《云南史料科目录概说》第五册809页，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

②汪宁生《云南考古》11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2册824页。

④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23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参见《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14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版。

⑥见《大理师专学报》1985年2~3期80页。

⑦此数字为1985年我们到该处拓碑，笔者亲自统计数。

⑧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北京。

⑨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3册937页。

⑩该铜观音像1941年被盗运至美国圣地哥艺术博物馆。

⑪~⑫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史料价值初探》（一）《云南文物》15期23页。

⑬石钟撰《大理喜洲访碑记》油印本第4页，1944年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昆明黄土坡小屯村。

⑭以上碑文见《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

作者工作单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

《金瓶梅》与白糖

《金瓶梅词话》写西门庆家筵不断，席上珍馐美味应有尽有，此时作者每每提到白糖，如43回吴月娘宴请乔太太时，奉上来的“果馅元宵，——都是银镶茶钟，金杏叶茶匙，放白糖、玫瑰，馨香美口”。再如45回吴月娘丫头给李桂姐“装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看来元宵以白糖做馅或用白糖单作的甜食，在当时受人青睐。白糖问世何时，据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云：

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坠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

明嘉靖帝在位45年（1522—1566），由“嘉靖中”白糖已问世，可推断《金瓶梅》的成书时限应在此后。这似可作为考察《金瓶梅》成书时限的一个例证。

• 郑平昆 •